

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

《林昌彝稿本》述考

程章灿

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《林昌彝稿本》，线装一册，书外有蓝色函套，署“林昌彝稿本”五字。封面左侧题《侯官林记 精校本》，右侧题“林侯官”，又钤有“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珍藏印”。按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建立于1928年，原名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，1965年改今名，则此书为该馆收藏在1965年之前。内有硬纸板护封，钤有“悦古斋记”朱文方印一枚。按悦古斋为何人之室名别号，检《清人室名别号索引》，未得其解，疑是书店名号。偶阅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清人梁章钜撰《制义丛话》，亦蓝色函套，硬纸护封，且同样钤有“悦古斋记”之印。《制义丛话》全八本，各本封面皆有四行英文印记：“CHINESE-JAPANESE COLLECTION; HARVARD COLLEGE LIBRARY; FROM 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; MAY 25 1932。”据此推测，《林昌彝稿本》很有可能与《制义丛话》同出悦古斋，而后同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所收，后又转为汉和图书馆（燕京图书馆）之收藏。因此，《林昌彝稿本》之归入哈佛，估计亦当在1932年左右。

一、《林昌彝稿本》即《砚鞋绪录》考

林昌彝（1803—1876）字惠常，福建侯官人（福州）人，生

活于晚清道、咸、同之世，是当时重要的诗人、学者及诗歌评论家，尤以《射鹰楼诗话》驰名于世。《林昌彝稿本》除封面题“侯官林记”、“林侯官”，第一页出现“侯官林○○○○”（当即“昌彝惠常”之省）之外，第三十一页也出现“经部 侯官林昌彝惠常”一行。《稿本》中亦有多处证据，证明此书出自林昌彝之手。今依次列举如下：

第二十九叶A面，“吾闽吾宗鹿原先生”，后“吾宗”二字改为“林”。可知作者为福建林氏。

第三十二叶A面第一行有“昌彝按”，第四十叶A面第二行亦有“昌彝案”之字样，可证作者即林昌彝无疑。

第三十三叶A面，“余别有说，入《温经日记》中。”按《清史列传·林昌彝传》及《林昌彝诗文集·前言》（王镇远、林虞生校点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，上海）中所列林氏著作目录中，并有《温经日记》。

第五十七叶A面，“《春秋内外传》星宿异名，阅者多未辨。儿子庆炳尝为之考明异名，颇便初学。”按此庆炳即林昌彝之长子，颇好经学。《林昌彝诗文集》中有《炳儿好解经其说〈易〉诸篇颇有理悟因成二十八字》（卷三，页74）、《为长儿庆炳娶继室》（卷七，页173）。林昌彝撰《先妣吴太安人行略》（卷十四，页329—333）中亦载：“孙庆炳、庆濂、庆铨。”此亦可证此稿本确实出自林昌彝之手，而非以他稿冒充者。

此外，稿本中还多次记到作者本人的行踪，如第三叶A面，“甲申余游学政和”，第十四叶A面，“丁未余游太室、少室山”，第二十三叶A面：“余辛丑北行，途出温州乐清”等。以林昌彝之生平行事考之，也莫不符合。

此稿本确为林氏所撰既已辨明，其书名及内容究竟如何，仍有待考证。毕竟所谓“稿本”云云，只是泛称。而稿本通篇不著书名，细加检阅，发现第三十一叶A面右上端有一行，约有数字

被墨笔涂抹，不易辨认。乃以此叶置灯下映照，则隐约可辨是“硯桂緒錄”四字，然犹未敢自必。遂检《林昌彝诗文集》，于卷十二（页295）得《硯桂緒錄弁言》。其文曰：“咸丰庚申，由五溪归里门，避暑道山亭。时方酷热，俗客不来，门户之福，毋容竹篱隔之。重检旧书，多丛杂，略为区分翻阅，凡经史子集之得失，及天地鬼神之屈伸，旁至格言医方，下及草木虫鱼，有疑义异闻者悉载之，多所论辨；其有关于心身性命可为世戒者，尤详记之，名曰《硯桂緒錄》。比之颜之推之《家训》，叶子奇之《草木子》，亦已僭矣。闭户九阅月，约记二十册，金华王兰汀鹺尹为分经史子集，厘为十六卷。”字面既合，稿本各条所记与《弁言》自述内容亦彼此相符（详下文），于是始敢断言，此即林昌彝《硯桂緒錄》之稿本。按：“桂”字有二训。《说文解字·耒部》：“桂，册叉可以划麦。河内用之，从耒，圭声。”段注：“可以划麦，即今俗用麦耙也。”“谓之册叉者，言其多爪可搭耙也。”《玉篇·耒部》亦谓：“桂，田器也。”而《广雅·释地》云：“桂，耕也。”书名中的“桂”，仍是用其第二义。硯耕者，笔耕之谓也。其所以用“桂”而不用“耕”，也许还兼取第一义，以影射本书爬梳旧籍、日积月累的特点。

二、《硯桂緒錄》厘定者王家齐考

据《弁言》，《硯桂緒錄》之厘定者为王兰汀。按兰汀名家齐，浙江金华人，林昌彝好友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林昌彝《衣聽山房诗集》刻于广州，书前有阮元、何绍基、林则徐、魏源等人的评赠。魏源、张际亮、姚燮诸师友皆为之题词。王兰汀为赋五言古诗四千字，对林氏之诗学颇致揄扬：“昨来岭外游，邂逅越水滨。示我盈囊作，展诵惊绝伦。万卷读皆破，驱使笔有神”（《林昌彝诗文集·附录》。）

王家齐与林昌彝有可能早已相识，也有可能是在同治初

(1862—1863) 昌彝游历并客居广州之时初识。《林昌彝诗文集》据《衣隐山房诗集》收入《金华王兰汀鹺尹家齐招饮柳堂展重阳》(卷八, 页204)、《近日诗寄王兰汀鹺尹》(卷八, 页205)、《画兰赠王兰汀鹺尹》(同上) 诸篇。按《衣隐山房诗集》录诗, 止于同治二年刻梓之时(参看王镇远、林虞生《林昌彝诗文集·前言》), 此诸篇系于诗集之最末一卷, 可知作于广州邂逅之时。

按《砚桂绪录弁言》, 此稿原为林氏咸丰十年(1860)夏至翌年(1861)春之间(所谓“闭户九阅月”), 里居读书札记。起初抄成二十册, 未必做过分类及系统整理。记成后不久, 林氏游粤, 可能携稿以行, 而为王家齐所见, 王遂为之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类。从前举诸诗看, 王、林二人在粤初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语曰: “白发如新, 倾盖如故。”王、林二人虽为新交, 而相知之谊乃逾于旧雨。这从林昌彝寄诗、画兰相赠, 以及王家齐招饮、为林氏诗集题诗诸事, 已可得到有力的证明。林昌彝《亡友王兰汀〈松石斋遗集〉序》(《林昌彝诗文集》卷十二, 页286—288) 虽然没有叙及二人相识的具体时日, 却颇为详细地记叙了他们之间的相知相得之乐: “酒酣笑言, 惟予与汝。披予诗卷, 许以千古。为镌六诗, 为较三《礼》。”又曰: “乙丑之春, 予应刘融斋学使襄校试卷, 鹺尹钱余, 击鲜与肥, 别筵悱惻, 把袂神驰。今夕一别, 明日天涯。黯然销魂, 聚首何时? 孰知一别, 竟成隔世。弥留遗札, 约再生相见, 情诗凄惋, 见者心悲。”据此, 王家齐不仅为林昌彝校《三礼通释》, 镌刊《衣隐山房诗集》亦多助力。王氏《题衣隐山房诗集诗》末自注云: “时方相与商榷古今道术学业及诗教宗旨”, 可见在广州之时, 二人过从甚密。此亦可旁证王氏为林昌彝厘定《砚桂绪录》当在此时。

三、《林昌彝稿本》之内容及价值

就我所知，《砚桂绪录》一书从未见著录或刊刻。诚如《弁言》所云，本书内容颇为庞杂，“凡经史子集之得失，及天地鬼神之屈伸，旁至格言医方，下及草木虫鱼，有疑义异闻者悉载之，多所论辨；其有关于心身性命可为世戒者，尤详记之。”其性质近于读书札记。封面所题“侯官林记”之“记”，盖即读书札记之意。盖当时翻阅之书颇为丛杂，并无一定主题，也未必预先即有一明确目的，故仅署以“侯官林记”。至于“砚桂绪录”之名，当系后来所题。估计林氏当日所记之二十册稿本，很有可能每一本之前都有“侯官林记”之类的字样。

《稿本》作者漫游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内容涉及医学、小学、民俗、诗文、书画、阴阳佛道、博物之学等等。医学方面，或记近代名医、小儿脉诀、民间偏方、病理、医书杂抄等。小学方面，涉及音韵、训诂、典实运用等。或考订字义，或辨别源流。如第五叶A面，考辨始见于《庄子》之“每下愈况”及“交接”一词之本义。又如第十叶B面，“道书多出奇字，人多不识”条中提到《道藏·八景王录》中所记上清高圣太上大道君者讳囍，“囍”与武则天造字“曷”颇为相似。这提示我们可以结合二者进行研究。民俗方面，作者很重视其渊源的探究。如第四叶B面“凡居宅中种槐，三世昌盛”条。又如第十叶A面，“民俗谓小儿指月，恐月割耳，谓之割耳疮。此有所本。《云笈七签·养生延命录》曰：‘凡小儿不及令指月，两耳后生疮，名曰月食疮。’按小儿生月食疮，须向月下拜一百又八而愈。见道书《续龙虎先鞭》。”按这一民俗传说至今还在林昌彝的故乡流行。作者是个诗人，也是一个诗歌评论家。在这部稿本中，也可见到他的一些诗文见解。如第十二叶B面提出诗文用典，要知源委，而不可任意改窜（由于集部已佚，这一方面的条目已不可多

见)。第十三叶A面谈到读书与藏书及治经之关系。书画也是作者十分感兴趣的一个主题。书中有关于赵子昂《杯酒谈心图》

(第十四叶B面)、汉代缪篆(第二十八叶A面)、唐代颜、李二家书法(第二十九叶B面)、八分(第四十三叶B面)等的讨论。除了儒家经典,作者也旁涉杂家及佛道书,第十叶A面谈到佛经中的龙树王菩萨,第十四叶A面则记道家丹药。至于笔墨之始(第十五叶B面)、天上雨物(第十八叶A面)、荔枝之异(第二十七叶A面)、置闰之法(第三十六叶B面)诸条,则是属于博物学的范畴了。

此外,第九叶B面“供鸭舌羹读书法”,如第二十一叶B面论“明人及近代人好著兵书,往往互相巢袭”,第四十二叶A面以为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录》,书名不安,应改为“国朝经学师承记”,第四十六叶B面指出江藩议论有疏略之处,还有关于明堂祭祀制度、经籍人物、旧解故训的辨证考订,都是在学术上值得重视的材料。在稿本第六叶A面,作者提出古代妇女有十不幸,对封建时代妇女的不幸遭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,对缠足之类的野蛮作法表达了自己的愤慨。其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珍贵的。

此书稿的写作方式大抵是随当日博览所见,凡有感发,即笔录之,间亦穿插若干平居或游历时之见闻。当时所读,以“旧书”为主,如《稿本》中提到的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三礼》郑注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广雅》、《风俗通》、《唐书》、《荀子》、桓谭《新论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六韬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北梦琐言》、《梁溪漫录》、《一切经音义》、《文选》等。但也有一部分是摘录时贤如钱大昕等的言论,或评论时人的诗文学术。不少条目中所提出的问题,对当今学者仍不无启发。对于研究林昌彝的经学及其学术思想也不失为一份重要的材料。

林昌彝与当世名流林则徐、魏源、张际亮、何绍基、陈澧等皆有交游。何绍基（1799—1873）字子贞，晚年自号蝮叟，湖南道州（今道县）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举进士，选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十八年（1838）散馆，授翰林院编修、武英殿协修。十九年（1839），朝命典福建乡试，为副主考。林昌彝即于此年中举。故昌彝虽仅少绍基四岁，按旧时科举惯例，却算是何氏的门生，故终其生，称绍基为师。自此以后，林、何二人关系颇为密切。

《砚桂绪录》中还记载了一则何绍基轶事：“某公以道州何猿叟师（名绍基）八字推定其数，持示猿叟师。师付火焚之不阅，笑曰：‘人惟明日之事不知，毕生之事不知，方能上达。若事事皆知，便为造化所使矣。’此吾师达人知命之一端也。”（第二十八叶A面）这段文字，使读者对于何绍基的人生态度有了生动的了解。稿本第二十九叶B面至第三十页B面，除前数句“唐人书法以颜鲁公、李北海为二大家，道州何子贞师于二家书法，均所私淑。颜书《大字麻姑仙坛记》，人间少有此本，师为钩摹翻刻，嗣湘中邹资甫孝廉又重摹再刻。李北海《秦望山法华寺碑》，人间亦少真本。师于咸丰己未为钩摹刊于涑源书院，所制跋语（此四字后删去），考核甚精”外，基本上是抄录何绍基的《跋重刻李北海书法华寺碑》（见《何绍基诗文集·东洲草堂文钞》卷十《题跋》，页892—894）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六十一岁的何绍基主讲济南涑源书院，此题跋即作于本年正月十九日。时隔仅一年，林昌彝就读到这篇题跋，并在读书札记中摘录其要，可以证明二人交往之密切。

林昌彝一生著作颇多，据《林昌彝诗文集·前言》所列，就有经、子、集诸部书二十八种，称之为“著作等身”，实非过誉。实际上，林氏之著作尚不止此数。仅《林昌彝诗文集》所提到的，就还有多种是《前言》所未提到的，其中，《鸿雪联吟》（《林昌彝诗文集》卷十二，页294，有《鸿雪联吟弁语》）、

《东瀛唱答》（同上书页295，有《东瀛唱答弁语》）二种，是与友人唱和的诗集。《昭代十二家古文》则是清代古文选本。今按稿本第五十七叶B面，“余别有《辨万氏周官辨非》二卷”。此书名、卷次并不见于《林昌彝诗文集·前言》中所列林氏著作目录，可补其缺。

清代名人墨迹传世者数量有限，晚清去今世不远，而由于动乱频仍，世无宁日，文物文献毁坏严重。这种《砚桂绪录》的稿本显然不是完帙。。《弁言》谓当时所记多达二十册，厘为十六卷，，今此书仅一册，五十七叶，不分卷，可见所缺卷页不少。按传统著述惯例，应当“经部”在前，“子部”在后。而《林昌彝稿本》则“子部”跃居“经部”之前。由此看来，这一册很有可能经过后人重新装订。所谓“经部”，计有二十七叶，所谓“子部”，计有三十叶，二者篇幅大致相当，也许这就是当时厘定的一卷的份量。这一推论若能成立，则《砚桂绪录》现存的只有全书的八分之一。这一份量虽然不够理想，却也聊胜于无，差强人意了。不知稿本其余的部分是否还存在于天壤之间？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